

捷克的「絲絨革命」與政權轉移過程

洪茂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一、前言

捷克 (Czechoslovakia) 的地理位置是在歐洲大陸的心臟地區，土地面積十二萬七千九百餘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五百五十餘萬人。這個由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合組而成的聯邦國家，境內居住有多種民族，即捷克族佔百分之六十三點四、斯洛伐克族佔百分之三十一點三、匈牙利族佔百分之三點八，其餘尚有少數波蘭族、烏克蘭族和日耳曼族等。①捷克斯洛伐克絕大部份的領土，曾是奧匈帝國的管轄範圍，一九一八年因哈布斯堡王朝 (The Habsburg) 崩潰始獲獨立，並且建立起一相當進步的民主政府。無奈此一屬西斯拉夫語系的中歐內陸國，命運坎坷，因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兩國與納粹德國簽訂了「慕尼黑協定」而成爲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個犧牲者。使得由馬薩里克 (Tomas Masaryk) 創建的民主共和政體，慘遭蹂躪。戰後，這個一九一八年才誕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 (Czechoslovak Republic) 曾力圖恢復民主體制，乃於一九四六年舉行自由選舉，成立了以議會民主取向的政府。不料，未及二年，由莫斯科扶植的捷共發動政變而奪取政權，從此，捷克斯洛伐克又陷入另一場災難，淪入鐵幕。一九六〇年七月，共黨政權頒佈新憲法，變更國號，改名爲「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Czechoslovak Socialist Republic)。直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革命」成功之後，政權順利轉移，國號再度更名爲「捷克暨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The Czech and Slovak Federal Republic)。由這一段歷史背景觀之，國人把這個中歐國家稱爲「捷克」，是不正確的。爲了遷就一般習慣用法，本文所提到的捷克，即指「捷克和斯洛伐克」，捷共即指「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

註① Der Fischer Weltatlas 1990, (Frankfurt a. M.: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9), p.534.

捷克斯洛伐克歷經共黨四十年的統治，其過程最受矚目者，乃出現兩起截然不同的發展，並且剛好相隔二十年。其一，一九六八年震撼東歐的「布拉格之春」，是一次由上而下的改革運動，但却不見容於莫斯科，僅僅二百天的光景，即遭到以蘇聯為首的華約集團的武力鎮壓，而告失敗。事隔二十一年，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布拉格又掀起如火如荼的示威浪潮，這一次是由下而上的改革運動，在學生、知識份子和工人携手合作下，終於迫使共黨就範，和平的交出政權。為此，本文的主旨擬就下列問題，解析捷克斯洛伐克如何由共黨「一黨專政」體制，轉換為「多黨民主」的國家。

問題之一，到底在什麼條件下，才導致捷克斯洛伐克邁向民主化。

問題之二，捷克斯洛伐克在民主化進程中，社會各階層的互動情形為何？表現了那些特點。

問題之三，共黨政權和平轉移之後，其政局動向為何？有那些變數會決定其未來的發展。

作者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相隔二十年的改革運動在東歐國家當中，表現極具特色，也有加以比較的必要。

二、民主化背景

從一九四八年捷共取得政權至一九八九年，這四十一載當中，前二十年捷共政權分別由三位領導人主政，即哥特瓦德自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薩帕托基（Antonín Zapatočky）自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以及諾沃特尼（Antonín Novotný）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根據這二十年政治發展的諸多跡象顯示，研究學者把它歸納為：史達林主義成長時期（一九四八～五三年）、史達林主義茁壯時期（一九五三～五七年）、史達林主義萎靡時期（一九五七～六三年），以及史達林主義癱瘓時期（一九六三～六八年），這正反映以上三位捷共領導人的角色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②一九四八年，狄托（Josip Broz Tito）與史達林決裂，南斯拉夫被趕出「共產情報局」（Cominform），捷共在史達林的支持下，剛剛取得政權，自然要站在莫斯科這一邊。因此，哥特瓦德隨即師承史達林的手段，開始整肅異己。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暴斃，蘇共領導階層出現權力鬥爭。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雪夫發表所謂的「秘密演說」，批判史達林，隨後鞭屍。顯然地，莫斯科政策的轉變對東歐國家也帶來了相當程度的衝擊，導致波蘭和匈牙利出現自由化運動。本來這段時間，捷克斯洛伐克也有民主化的機會，但因波蘭和匈牙利的自由化，均遭到莫斯科的干預或鎮壓，使得布拉格當局採取更強硬作風。一九五六年爆發的皮爾森（Pízen Pilsen）事件，捷共即毫不手軟的以武力鎮壓了工人的反共運動，在諾沃特尼掌權

註② Otto Ulic, *Politics in Czechoslovakia*,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74), p.3.

十年中，由於保守派和改革派僵持不下，經濟改革失敗，知識份子不滿情緒日益升高，終於逐漸醞釀「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動力。

據一九八六年統計，捷共擁有黨員一百六十五萬人之多，約佔其總人口的百分之十點六。^③照理說，共產黨憑着憲法中保障「一黨專政」的條款，足以壟斷所有勢力和國家資源，情治系統密佈全國每個角落，大可為所欲為。可是，布拉格當局何以會在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交替之際，在陰溝裏翻船，把四十年來牢牢築起的紅色政權，僅在一個月之間拱手讓給反對勢力？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改革，基本上，是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醞釀，才有所突破。那麼，捷克斯洛伐克是在什麼背景下，導致發生一場頗引人津津樂道的所謂「絲絨革命」(the velvet revolution)^④呢？一般認為，民主化的條件因國情不同，很難建立一套通則。不過，其內外條件還是可以找出端倪。就在條件而言，可能涉及一些因素，如領導階層特質、政治文化、經濟發展程度、社會流動(自主性)，以及教育水平等等；而就外在條件而言，則基本上來自國家間的互動關係，和國際社會的壓力。從捷克斯洛伐克邁向民主化的背景看來，其主要影響因素，大體上可就下列二方面分析：

首先，內在條件這一方面，可歸納三項基本因素：

(一)政治因素：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運動遭到封殺之後，捷共保守派接掌政權，政策改弦易轍，史達林主義的統治模式又重新運作。其中最引人側目者：其一，整肅異己，把黨內所有支持「布拉格之春」的幹部或黨員，幾乎全部清洗出黨，據估計至少有五十萬名黨員遭開除。^⑤其二，加緊控制思想和實行嚴格新聞檢查，採高壓手段，嚴禁各項非官方的公開性活動。因此，一九七〇、八〇年代，捷克斯洛伐克迫害人權的紀錄，已惡名昭彰，引起國際社會的關切。^⑥至於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就任蘇共總書記之後，由於克里姆林宮一反過去大幅調整內外政策，展開一系列所謂「改造」(Perestroika)和「公開性」(Glasnost)的新措施。莫斯科政策的轉變，帶給布拉格當局進退維谷，難以適從。因為若配合戈巴契夫的改革方針，等於肯定了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正當性，這無異說明了鎮壓當年的改革運動是錯誤的行為。相反地，如抗拒改革，非但不符合蘇聯的現行政策，恐遭非議，而且亦將更難擺平黨內外要求改革的壓力。一九八七年捷共領導階層已擺出有意進行改革的姿態，但因權力核心老化，領導人胡薩克(Gustav Husak)逾七十五高齡，政策依然保守，改革進程極為緩慢。在這種情況下，捷共已陷入困境，喪失民心，正如哈維爾(Vaclav Havel)所說，處於

註③ Richard F. Staar, "Checklist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1985," *Problems of Communism* 35(Mar.-Apr. 1986), p. 65.

註④ *Der Spiegel*, Nr. 51/1989, pp. 118-120.

註⑤ *Ibid.*

註⑥ *Der Spiegel*, Nr. 45/1989, pp. 198-199.

「壓力鍋」狀態，隨時有爆炸的可能。^⑦

(二)經濟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曾是排名世界十大工業發達國家，機械、化工、汽車以及軍火等工業均名聞遐邇。可是，戰後共黨接管政權之後，經濟發展每下愈況，不但無法達成每年規定的成長指標，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呆滯不前，少有改善。六〇年代諾沃特尼當政時，即試圖扭轉經濟窘境，乃委託當時著名的經濟學者錫克教授(Ota Šik)研擬經濟改革方案。錫克教授曾提出「以市場導向的社會主義」模式，但因在黨內引發路線之爭，仍然難以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致使經改無法落實。^⑧及至一九六八年二月，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接任捷共中央第一書記之後，即以推動「具有人道色彩的社會主義」自許，力求變法圖強，同時展開政治和經濟改革，於是「布拉格之春」不同凡響，舉世矚目，可惜，僅僅二百天的壽命而告夭折。自此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發展再度局限在馬列教條的窠臼裏，無從發揮。從某些現象，即可證明捷共領導階層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已束手無策，無能為力。最顯明的例子，如工業設備陳舊，效率低落，生產力和品質逐漸下降，已失去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再者，環境污染嚴重，全國林地有三分之一受到酸雨破壞，農業生產亦遭波及。^⑨一九八七年三月，捷共召開中央全會時，除了高度評價蘇共的改革措施外，並決議進行「經濟機制改革，調動社會各方面積極性和有效地把科技的成果應用於實踐問題」。^⑩不過，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沉疴，已不是修修補補的改革手段所能克服，人民對捷共政權已完全失去信心。

(三)社會因素：一九六八年由杜布切克領導的「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雖然遭遇外力的干涉而宣告失敗。但從種種跡象顯示，「布拉格之春」的精神深植民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非但對杜氏所開創的「布拉格之春」記憶猶新，念念不忘，而且對保守頑固的捷共當權派不時發出不平之鳴，其中最突出的一些現象，諸如，一九七七年成立的「七七憲章」人權團體，即糾合作家和藝術家等文化界知識份子，揭開捷共當局迫害人權的事實，同時逐漸形成對抗共黨的核心組織，並為爾後「公民論壇」成立的主要催生力量；^⑪每逢八月二十一日和一月十五日或明或暗紀念「布拉格之春」，藉機抗議，並以「布拉格之春」之名舉行音樂季活動；環保意識抬頭，青年學生名正言順，乘機活動，光在一九八八年即有三十個不同形式的團體，先

註⑦ Ibid.

註⑧ Radoslav Selucky,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pp. 82-83.

註⑨ Jiri Kosta, "Systemwandel in der Tschechoslowakei, Ökonomische und Politische Aspekte", *Osteurop.*, Nr. 9/90, pp. 802-818.

註⑩ Ibid.

註⑪ 同註⑥。

後成立，成爲反抗共黨政權的生力軍；^⑫最後，教會的角色舉足輕重，雖然屢遭共黨壓迫，但在緊要關頭，都能挺身而出，一方面掩護反對勢力，另一方面扮演潤滑劑，疏解社會衝突。一九八〇年代波蘭天主教會的一舉一動，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天主教會也直接地發生了鼓舞作用，敢於動員群眾力量，幾可使共黨喪膽。因此，「十一月革命」爆發時才有所謂「絲絨般」溫和的過程。

其次，在外在條件方面，這可以說是捷克斯洛伐克邁向民主化的「大氣候」。換言之，布拉格沒有這股「大氣候」的形成，光是內在的「小氣候」環境，不是足以匯合一股强有力的風潮，把根深柢固的「紅色大樹」推倒？不無疑問。因此，一般咸信，導致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民主之路，國際因素才是主要關鍵。

(四)國際因素：一九六八年由上而下的一次改革運動，因爲沒有外在條件的配合，終於悲劇收場。當時蘇共領導人布里茲涅夫認爲，做爲「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成員，就得要遵守共同規律，不得擅自改變路線或脫離「社會主義大家庭」，否則這個大家庭有責任進行干預，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成員，其國家主權是有限的。^⑬不過，二十年後，蘇共新一代領導人上台，却一反過去，竟以所謂「新政治思維」出發，不惜放棄「唯我獨尊」的霸權政策。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排除「布里茲涅夫主義」的陰影，而促使東歐局勢快速變化，乃得力於戈巴契夫實行「新政」的結果。至於直接影響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改革的主要關鍵爲何？基本上可歸納三項決定因素：其一，一九八七年四月，戈巴契夫訪問布拉格，公開宣示「社會主義建設的多樣性」，沒有統一的模式。戈氏更直截了當的表示，「任何黨不能壟斷真理」。^⑭這無疑地間接平反了「布拉格之春」事件，等於鼓勵捷共當局，你們儘可放手改革。其二，波蘭和匈牙利先後出現劃時代的創舉，前者成立了東歐第一個「非共」領導的政府，而後者竟然革了共產黨的命，首次開啟共產黨自行廢黨，宣佈與馬列主義決裂的先例。波、匈兩國這種驚天動地的變革，莫斯科並未加以干預。其三，一向以正統馬列主義自居的東德，一直被認爲政局最穩定，是華約集團最可靠的盟友。可是，東柏林政權却是那麼脆弱，居然在難民潮和群眾示威的怒吼下垮台。很明顯地，捷克斯洛伐克在這樣外在環境的刺激下，已沒有能力擺脫「骨牌效應」的衝擊。

三、「布拉格之春」的精神

無疑地，討論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進程，基本上應以一九六八年做爲分水嶺。因爲，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改

^⑫ Der Spiegel, 48/1989, pp.166-171.

^⑬ Harry Hanak(ed.),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Death of Stalin*,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pp.271-275.

^⑭ The Times, April 13, 1987, pp.1-2.

革運動，非但對捷克斯洛伐克本身奠定思想啟蒙的基礎，而且也為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在「更新社會主義」的倡導下，提供了具有催化作用的啟示。例如蘇共新黨章所揭櫫的「人道和法治的社會主義」，^⑮與杜布切克所倡導的理念不謀而合。

為敘述方便，使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進程有個脈絡可尋，作者擬將整個民主化進程歸納為五個時期。因前兩個時期是以「布拉格之春」為樞紐而成一完整的階段，故本段將先探討前兩個時期。後三個時期則是以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月革命」為重心，就其前因後果進行剖析，將留待下一段討論。

首先，是以「布拉格之春」為主的前兩個時期概述如下：

(一)民主化起步時期（一九六八年二月至八月）：杜布切克是斯洛伐克人，一九六八年一月，他以四十七歲壯年脫穎而出，擢升共黨中央第一書記，誠非易事。杜氏年幼時，曾隨父旅居蘇聯，並完成中小學教育，於一九三八年返國。次年，加入共產黨。杜氏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在納粹佔領捷克斯洛伐克期間，曾參與反納粹地下活動，兩度受傷。一九五五年，由於他表現傑出，獲保送進入莫斯科高級政治學校深造，三年後，學成歸國。至一九六八年這十年中，他的仕途可以說平步青雲，極為順暢。一九六〇年出任斯洛伐克共黨第一書記，同時亦為捷共中央主席團成員。^⑯或許杜布切克在莫斯科求學期間，經歷過史達林和赫魯雪夫二位截然不同的領導風格，感觸良多，尤其對赫魯雪夫敢於向根深柢固的權威偶像開刀，打擊官僚惡習，展現改革新氣象等等作為，留下深刻印象而激發他日後的改革動機。杜氏出任捷共領導人之後乃一反過去，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其民主化的具體表徵，僅舉其要者：

1. 實行黨政分離。杜氏放棄往昔慣例，將黨政大權分開，國家總統改由史沃伯達（Ludvik Svoboda）擔任，他專任共黨第一書記。

2. 頒佈新的行動綱領。在四月十三日發表了民主改革的行動綱領，^⑰其主要內容為：經濟方面——企業管理權下放，「經濟計畫」受國民議會的監督，重視市場的積極功能，企業單位負責人經由民主方式產生；工人會議代表，有權過問經濟管理，農業合作社有獨立權，小企業有合法地位。政治方面——停止黨與國家機關、經濟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相互關係；黨的決議，僅對在各單位中工作的黨員有約束，黨員在黨內不僅有權，而且有義務發表不同意見；人民的自由或干預，應以法律為依據；取消秘密警察的特殊地位；人民有自由行動權，包括赴國外旅行。文化方面——藝術完全自由。這是蘇聯集團中最富自

註⑮ *Osturova*, Nr. 1/1991, pp. 15-45.

註⑯ Harry Schwartz, *Praque's 200 Days: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 李宜培譯，捷京二日，台北，今日世界社，民國六十四年七月，頁四一～四九。

註⑰ 同註⑯，頁六八～六九。

由色彩的政策聲明。¹⁸

3. 取消新聞檢查。容許大眾傳播媒體對時政的批評，一向為共黨控制的作家協會如魚得水，百家爭鳴，呈現空前的創作自由。¹⁹

4. 允許某種程度政治多元化。議會已不再是共黨的橡皮圖章，可以公開自由辯論，得對政府官員提出不信任案；國會議員會能發揮審計或調查的功能。五月，頒佈大赦令，釋放政治犯。²⁰

5. 社會團體的自主性抬頭。傳統上由共黨控制的群眾組織——作家聯盟、新聞記者聯盟，以及其他職業聯盟等，其所屬次級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脫離自立門戶。其中最受注目者，由異議份子籌組的團體如「231俱樂部」和「KAN俱樂部」等尤為活躍。²¹這種自主性，都是過去共黨政權所不容許的。

(二) 民主化停滯時期（一九六八年九月至一九八五年三月）：「布拉格之春」在布里茲涅夫「有限主權論」的威嚇下，僅曇花一現，悲劇落幕。從此，捷克斯洛伐克又回到獨裁統治的老路，歷時十七年之久。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蘇聯率領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華約國家軍隊，利用凌晨時刻大舉入侵同屬華約集團的捷克。根據「塔斯社」事後發表的文件指出，華約五國之所以進兵布拉格，係應「捷共和政府領袖之緊急援助請求。」²²事實上，這完全是莫斯科為了一師出有名「捏造出來的託辭。當時，克里姆林宮真正擔心者，乃是捷克的自由化不僅直接傷害共黨集團的政治利益，而且也可能間接影響鄰近東歐國家紛紛效法跟進，終而導致社會主義大家庭的解體。因此，克宮領導階層從杜布切克一上台所展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開始，即感到不安，曾多次施壓，諸如透過媒體的警告，公開場合的抨擊，甚至舉行攤牌性的談判。²³最終莫斯科深感「事態嚴重」，唯恐若是容忍「布拉格之春」開花結果，此例一開，其後果堪虞。所以，蘇聯乃以華約之名，動兵平息了這一場轟動國際的自由火花。自此所謂的「布里茲涅夫主義」的陰影一直籠罩整個東歐，尤其捷克遭遇到嚴重打擊，致使民主化的脚步完全停頓下來。在這二十年當中，捷共政權所作所為，更趨頑固保守，茲舉其要者如下：

註¹⁸ 同註¹⁵，頁100。

註¹⁹ Bohumil Frei, *Tschechoslovakische Geschichte und Staat*, (München: Günter Olzog Verlag 1968), pp. 65-66.

註²⁰ *Ibid.*

註²¹ Peter Summerscale, *The East European Predicament: Changing Patterns in Poland, Czechoslovakia and Roman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p. 98-100.

註²² 郭銘鼎，*捷克之悲劇*，台北，廣文書局，民國五十八年五月，頁三六八。

註²³ 同註¹⁶，頁一二六。

1. 進行大整肅運動，杜布切克及其改革支持者悉數被開革出黨；杜氏在華約之軍隊入侵捷克前夕，曾被押解前往莫斯科，在克宮逼迫下同意辭職。²⁴由於杜布切克在國際社會享有改革者的美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擁戴，蘇共當局不敢草率以「反革命」罪名拘捕，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始正式解除捷共第一書記職務，轉任國民議會主席（四月至九月），隨後短時間奉調駐土耳其大使，到了一九七〇年所有黨內職位全被解除。同年六月，杜氏的共產黨員身份亦難確保遭開除，由此行動受到監視近二十年。當時，約有五十萬名捷共黨員，因支持改革同遭整肅清洗。²⁵

2. 修改憲法，調整國家機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一年曾兩度修憲，強化中央集權，使一九一八年建國以來地方分權的色彩完全改觀。胡薩克接替杜布切克就任捷共第一書記後，隨即把共黨領袖頭銜更改為總書記，向莫斯科看齊。胡氏並於一九七五年起兼任總書記一職，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²⁶

3. 蘇聯的政策唯命是從：一九七〇年蘇捷簽訂友好條約，有關「有限主權論」之說並列其中，使莫斯科率領華約集團的人侵行動合法化。²⁷一九七一年捷共召開「十四大」，所有改革派全被開革，親蘇的保守派重新控制整個官僚體系。從此，蘇聯的意志若隱若現地左右捷克政局。

4. 異議份子揭窠「七七憲章」，展開人權運動：一九七七年一群對捷共政權的不滿份子，依據聯合國人權宣言和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精神，發起簽署所謂「七七憲章」。參與該項憲章的異議份子絕大多數是作家、音樂家、記者、醫生、教士等知識份子，如哈威爾、丁斯特皮爾（Jiri Dienstbier）等著名人士，後來均出任政府要職。²⁸該團體的主旨即提醒國際社會對捷共政權迫害人權紀錄應寄予關切，並期望扮演政府與不滿民衆之間調停者的角色，俾減輕社會衝突。²⁹儘管此一不滿團體的活動符合捷克法律規定，但仍被布拉格特務機關視為眼中釘，活躍份子屢遭逮捕和迫害。

5. 繼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改革停擺，經濟發展呆滯：捷共在一九七一年召開「十四大」時，宣稱「已克服了黨內和社會上的危機」，經濟方針提出在充分利用集約化增長因素的基礎上不斷全面提高國民經濟發展效率。³⁰一九七六年的「十五

²⁴ Vilém Práan, *Die Sieben Jahre von Prag 1969-1976*, (Frankfurt a. M.: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pp.33-70.

²⁵ *Ibid.*

²⁶ Richard F. Staar,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3), pp.78-79.

²⁷ Alexander Uschakov, Dietrich Frenke, *Der Warschauer Pakt und Seine Bilateralen Bündnisverträge*, (Berlin: Berlin Verlag Arno Spitz, 1987), pp.121-130.

²⁸ *Der Spiegel*, Nr. 13/1989, pp.154-156.

²⁹ 同註²⁸。

³⁰ 同註²⁸。

大」和一九八一年的「十六大」，老調重彈，要進一步完善計畫和管理工作，並在工農業領域貫徹實施。^③其實，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官樣文章，根本無法因應二次能源危機的衝擊，導致一九八〇年代之後，經濟發展每下愈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已非昔日所可比擬。

四、「十一月革命」的緣起

一九八五年三月，新一代的蘇共領導人戈巴契夫上台之後，由於標榜「新政治思維」，大力倡導「改造」(Perestroika)和「公開性」(Glasnost)政策，使得東歐國家發生空前的變革，捷克亦在此一大潮流中逐步向民主推進，終得完成「十一月革命」的壯舉，特將其進程以三個時期分析如下：

(一)改革觀望時期(一九八五年三月至一九八七年四月)：當莫斯科開始改弦易轍時，布拉格當局自然不能視若無睹，毫不理會。不過，採強硬路線的捷共領導階層對「布拉格之春」的悲劇記憶猶新，若盲目跟進，無異自毀立場，等於承認鎮壓一九六八年的改革運動是錯誤的。況且，胡薩克領導班底，可能還心存疑慮，戈氏的領導地位是否鞏固。因此，自一九八五年蘇共新的權力核心接班之後二年期間，布拉格的掌舵手基本上是採觀望態度，並沒有積極回應莫斯科的改革方針。此一時期，較受注目的作為如下：

1. 一九八六年三月廿四日至廿八日，捷共召開「十七大」通過一九八六、九〇年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方向，以及至二〇〇〇年遠景規劃等。隨後，胡薩克第五度當選捷共總書記。本次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仍甚保守，並未如同蘇共「廿七大」具體的勾劃改革步驟與方向，做了突破性的調整。同年六月十三日舉行聯邦議會改選，捷共在議會的席次一直控制三分之二以上，其餘則分配給尾巴黨或親共的無黨籍人士。

2. 一九八七年三月，捷共召開中央全會，對莫斯科所推行的改革政策首度表示一致支持和高度評價。同時，討論準備進行經濟機制改革和進一步發揚民主、調動社會各方面積極性，以及有效地應用科技成果於實踐問題上。^④顯然地，布拉格當局已體認到克宮的「方向球」至為明顯，非得「見風轉舵」不可。

3. 戈巴契夫正式走訪布拉格，揭示莫斯科的「新東歐政策」。戈巴契夫就任蘇共領袖二年之後，於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世界知識年鑒，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四四三。

才到捷克進行三天的正式訪問，並在蘇捷友好協會發表政策性的演說，首次正式揭示莫斯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政策方針。戈氏在該次演說中提到三點，特別受到注目：其一，社會主義建設可根據本國的條件，選擇發展的道路。其二，尊重獨立自主，平等互惠。其三，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應相互學習，沒有「共同規律」，任何黨不能壟斷真理。³³無疑地，戈氏這一席話標誌著兩項劃時代的意義：第一，肯定社會主義建設多元化發展的可行性。第二，等於宣告布里茲涅夫主義已經死亡。戈巴契夫新東歐政策的宣示，的確為東歐民主化鋪平道路。

(二)改革再出發時期（一九八七年五月至一九八九年十月）：布拉格面對戈巴契夫推行的「新政」，以及咫尺相連的波蘭和匈牙利洶湧澎湃的民主化浪潮，不得不順應時勢，改變既定政策。因此，自戈巴契夫訪問捷克之後，即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逐步推出。由於「布拉格之春」的複雜情結，加上克里姆林宮對該事件的是非依然保持緘默，致使捷共當局在改革進程上，猶豫不決，遠不如波、匈兩國那麼勇往直前，僅採小步伐漸進策略。這一時期最突出的作為，簡要列舉如下：

1. 領導階層改組。在位十九年的胡薩克，以七十五歲高齡年老體衰為由，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辭去捷共總書記一職，遺缺由負責經濟事務的政治局委員雅克石（Miloš Jakes）接任，但胡氏仍保留總統職位。次年十月，聯邦政府人事大調動，在位十八年的總理史特勞加爾（Lubomir Strougal）被革職，改由溫和派的阿達梅茨（Ladislav Adamec）升任。捷共更動領導階層，乃期望克服日益惡化的經濟困境。不過，新領導班子的作風，仍保守有餘，創新不足，只在經濟領域進行小幅度的改革，既不徹底又不敢觸及政治體制。

2. 逐漸突破「政治禁區」，異議份子敢向共黨極權挑戰。首先是領導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領袖杜布切克再度露面，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出國接受義大利波洛尼亞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並公開發表演說，批評捷共迫害異己情況，對外力干預十八年前的改革予以譴責。³⁴其後，杜氏在一九八九年三、四月間，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之音以及匈牙利國營電視台等外國媒體訪問時，亦毫不掩飾地敘述他當年的改革政策，無怨無悔，但要求重新評價「布拉格之春」的始末，還他清白。³⁵於此同時，他也積極聲援異議團體的活動。緊隨著杜氏的公開露面，異議份子開始展開整合。一九八九年六月，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獲勝，使東歐國家的反對勢力士氣大增。杜氏與異議團體隨即「乘勝追擊」，聯合二千餘名文化界人士和著名異議份子，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向政府公開發表所謂「數句進言」請願書，要求「真正對話」，「

註³³ 同註¹⁴。

註³⁴ 自立早報，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第十二版。

註³⁵ 自由時報，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十日，第六版。

真正改變」與「廣泛的政治改革」。³⁶這份以「幾句話」為標題的請願書特別呼籲，「改變社會氣候作為走向真正改革的第一步」，尤其是「立刻釋放政治犯」，與給予集會結社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該請願書同時要求「廢除一切形式的政治控制和審查」，對可能嚴重影響環境的工程，需適當執行公眾意見。儘管這份請願書遭到捷共機關報紅色權利報尖銳的批判，指為「出賣社會主義」。³⁷不過，此項請願甚得社會共鳴，增強了爾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推翻共黨政權的動力。

3. 紀念「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廿一周年，布拉格市中心二十年來，首度聚集數千人大規模示威活動，並有來自義大利、波蘭和匈牙利的支持者參與聲援，場面甚為緊張。警方曾逮捕三百餘人，參加示威的外籍人士悉數被驅逐出境。事後，捷共領導階層一再聲明，拒絕波、匈模式的改革。³⁸惟布拉格領導班子的態度，似有改變過去強硬作風的跡象。總理阿達梅茨於十月訪問維也納時，首次向記者表示，一九六八年發生的「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之中，的確有部份「良性因素」。隨後，阿氏又公開聲明，他支持廣泛「民主」，但必須在穩定的局勢下維持秩序和法律。³⁹不過，捷共政權仍「抱殘守缺」，不肯與反對團體對話，不容許動搖共黨的領導地位。

4. 研擬經濟機制改革措施，以紓解內部日益升高的壓力。聯邦政府與兩個共和國政府於十月二日舉行二十年來第一次聯席會議，討論實施經濟機制改革問題，期能統一步驟，為一九九〇年起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全面貫徹新的經濟機制原則做準備。其主要手段即通過嚴格控制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和提高消費品生產來解決國內市場的平衡問題。不允許無計畫的增加基本建設，並不再增加外債。⁴⁰

5. 東德的難民潮、匈共的宣佈廢黨，以及何內克的垮台等劃時代的變化，不僅直接對捷共造成莫大的心理壓力，同時也鼓舞了反對勢力的勇氣和信心。十月二十八日是捷克斯洛伐克獨立紀念日，異議份子乃藉此機會發起慶祝活動，共有一萬多人走上布拉格市中心廣場，他們敢公開向捷共挑戰，要求雅克石下台，並立即進行對話。⁴¹這是二十多年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布拉格行政當局已深切體認，改革潮流無可抗拒，隨後宣佈放寬人民出國限制，准許自由赴西方國家旅行。⁴²

註³⁶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第四版。

註³⁷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第三版。

註³⁸ 自由時報，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第六版。

註³⁹ 台灣時報，民國七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第十一版。

註⁴⁰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月四日，第三版。

註⁴¹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三版。

註⁴² 自由時報，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第十五版。

(三)實現民主化時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以後)：隨著波蘭和匈牙利民主化的快速進展，以及「柏林圍牆」突如其來的倒塌，捷克內部也像骨牌效應般地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布拉格共黨領導階層所執行的小步伐改革政策，不僅無法滿足內在日益高漲的改革運動之要求，而且也不能配合外在環境的現實，尤其莫斯科都已明確揭棄「改造」和「公開性」政策，捷共沒有理由故步自封，再繼續抗拒民主潮流。因此，當十一月中旬開始掀起一連串空前的示威浪潮後，僅僅八天，捷共被迫向廣大群眾低頭，交出權力，為時二十一載的布拉格冰冷的政治氣候，神妙地回到充滿希望的「春天」，等於完成了一次「絲絨般的和平革命」。此一過程最具關鍵性的轉折，可歸納如下：

1. 和平革命的導火線：原來為紀念五十年前(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因抗議納粹佔領而遭殺害的學生，後來却演變成對民主的訴求，終於觸發了所謂「布拉格的十一月革命」。十一月十七日這一次的紀念活動，最具諷刺意義的是，策劃者是捷共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聯盟」，這些大學生首先在查爾斯大學醫院集合，高喊「雅克石下台」，要求和政府就國家前途進行對話，示威人群越聚越多，超過萬人以上，算是二十年來最壯觀場面。由於隊伍朝向市中心移動，遂遭武裝警察棍棒襲擊，鎮暴部隊並動用催淚瓦斯予以驅散。布拉格警察當局對手無寸鐵的學生施暴，立即引起大學生和市民的不滿。於是「反共」情緒高昂，二十年被壓抑的憤怒之氣有如「壓力鍋」，隨即爆發，威力十足地衝破共黨強行設定的社會枷鎖，一波又一波的人民大眾走上市中心廣場，在十天之內，每日的示威群眾由數萬人增加到三十萬人。^{④③}顯然地，共黨的權威防線在一股勢不可擋的人民自發性力量挑戰下，宣告失守。

2. 反對力量挾群眾運動餘威，快速整合成立「公民論壇」，足可對捷共政權制衡。十一月十九日包括「七七憲章」人權運動組織在內的十二個反對團體公開宣佈成立「公民論壇」。參與此一反捷共政府組織的發起人，除了劇作家哈維爾、「布拉格之春」時代的外交部長哈雅克(Jiri Hajek)等著名異議人士外，尚有不滿政府施政作為的官員，以及「非共」政黨的高層領導和工人代表等三百餘人。^{④④}「公民論壇」的主要訴求：其一，共黨領導階層應對一九六八年華約集團的入侵及隨後二十年國家之衰退負責，這些人應立刻下台。^{④⑤}其二，內政部長和布拉格共黨領導人對十七日的鎮壓行動負起政治責任引咎辭職。其三，成立包括「公民論壇」代表在內的調查委員會，調查血腥鎮壓學生示威的責任。其四，釋放政治犯，並開放新聞自由。^{④⑥}「公民論壇」有組織又有清晰的綱領，使這一次要求改革的社會運動，出乎意料的成功。

註④③ 同註①②。

註④④ 聯合晚報，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第十一版。

註④⑤ 同註④④。

註④⑥ 同註④④。

3. 知識份子、學生和工人大團結，迫使捷共放棄「一黨專政」，回歸民主。群眾示威浪潮升高之初，捷共試圖力挽狂瀾，扭轉危機，國防部長於十一月廿四日曾揚言，若出現無政府狀態，軍隊將進行干預，以保衛社會主義。^{④7}不過，因為北平「六四天安門事件」引起全世界輿論的公憤，陰影猶在，加上內外環境的不利因素，捷共領導階層只好在「動武或改組」之間，兩害相權取其輕，以更換領導人來緩和內部的緊張。因此，上台只两年的雅克石不得不悄然退位（十一月廿四日），而改由一位與鎮壓「布拉格之春」毫無瓜葛的新面孔瓦班內克接任。但是，捷共倉促的反應，為時已晚，反對力量乘勝追擊，對布拉格領導階層的更替，不但不表滿意，反而進一步要求，捷共放棄權力壟斷，成立聯合政府。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全國性二小時警告性大罷工下，捷共已深切體認，民主潮流難以抵擋，乃於十一月廿九日放棄共黨在憲法中領導一切社會力量的保障條款。^{④8}隨後，在十二月九日政府大改組，二十一名聯邦內閣成員中，有十一名為「非共」黨籍，成為一九四八年以來，首次由「非共」領導的政府。最引起世人注目者，曾屢遭迫害坐牢的著名劇作家哈維爾，於十二月卅日被推選為總統，接替保守強硬的胡薩克（十二月十日被迫辭職），而領導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深受人民擁戴的杜布切克，則於十二月廿八日膺選聯邦議會主席。由此，布拉格的政治氣候大為改觀，二十一年的「冰冷嚴冬」宛如「大地春回」，充滿生機，一片欣欣向榮景象。次年三月廿九日，聯邦議會又正式通過決議，把原來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號，更改為「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國家社會主義」的中央統制終被劃上休止符，成為歷史名詞。

2. 舉行自由選舉，恢復議會民主體制。繼東德、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舉行戰後第一次自由選舉之後，捷克也在六月八日舉行大選。聯邦議會採二院制，即人民院和民族院，前者有一百五十個議席，按人口比例產生，後者有一百五十席，由二個共和國各分配七十五席。這項一九四八年以來首次自由選舉的結果如下：人民院——「公民論壇」及「公眾反暴力組織」有八十七席（占百分之四六點六）、共產黨二十四席（占百分之十三點六）、基督民主聯盟二十席（占百分之十二）、摩拉維亞——西里斯社團九席（占百分之五點四）、斯洛伐克民族黨六席（占百分之三點五）、「共存」組織（少數黨）四席（占百分之二點八）。民族院——「公民論壇」及「公眾反暴力組織」八十二席（占百分之四五點九）、共產黨二十四席（占百分之十三點七）、基督民主聯盟二十席（占百分之十一點三）、斯洛伐克民族黨九席（占百分之三點六）、摩拉維亞——西里斯社團八席（占百分之六點二）、「共存」組織（少數黨）七席（占百分之二點七）。^{④9}在這次選舉中所反映的訊息，至少有三

註47 自由時報，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十五版。

註48 Der Spiegel, 49/1989, pp.170-171.

註49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十二日，第九版。

點頗具意義：其一，投票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六，是所有東歐國家首次舉行自由選舉最高紀錄者，正顯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政治意識強烈，有高度警覺性，積極參與投票始能解除共產黨根深柢固的權力。其二，共黨得票率只有百分之十三，雖名列第二位，但與「公民論壇」的差距甚遠，這不但說明了共產黨已喪失民心，而且也證明了過去的選舉完全由共黨操縱，毫無公平可言。其三，「公民論壇」整合反對力量，推翻了共黨政權，贏得民心，選民寄以厚望。

五、具體改革措施

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的改革運動，其相同處均起因於經濟危機。在共黨極權統治的社會中，政權的不穩定總是因為經濟指導部門的無能所引起，例如：一九五三年的東德工潮事件，一九五六、七〇和八〇年的波蘭工人抗暴事件，以及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等。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也是如此。基本上，一九六八年布拉格的改革運動是「由上而下」帶動起來的，要是沒有和一九六〇年代初同樣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例如：民生必需品缺乏、生活水準下降等），自由運動就不致於發生。在經濟困境的情況下，共黨領導人爲了保住政權，於是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因此經濟因素乃是促成當時經改的主要動力。

一九七〇年中期，捷克的經濟狀況開始惡化，國民所得下降，個人消費降低。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亦出現了經濟成長危機，使捷克經濟幾乎近於癱瘓。其中值得一提的經濟問題可歸納下列四方面：第一，因經濟管理機制的缺失而導致百分之五十的能源浪費，水泥和鋼鐵的浪費更是嚴重。^⑥第二，一方面成長瓶頸無法突破，致使供應缺乏；另一方面卻又發生倉儲爆滿，產品滯銷的情形，這充分反應了中央計畫經濟之供需失衡的老毛病。第三，四十年來，外銷的機器比實際計畫少三分之一，而且生產機器的技術亦十分落伍。第四，一九五〇年代以來一面倒地發展重工業，而偏廢了民生物資工業、服務業和基礎建設；環境污染亦是發展重工業的惡果。在製造公害方面，捷克在歐洲名列第一，國民平均壽命則是倒數第二。^⑦面對上述的問題，胡薩克領導的政府終於被迫推行改革，然其經改決策小組仍是中央計畫的官僚和食古不化的忠黨經濟學者，而支持市場經濟的獨立學者甚少，因此改革運動猶如隔靴搔癢，不見成效。

一九八五年蘇聯領袖戈巴契夫上台之後，在他倡導的改造新思維影響下，使捷克經濟改革嶄露生機。雖然一九八〇年代

註⑥ Jiri Kostar, *op. cit.*, p. 806.

註⑦ *Ibid.*

末期與一九六〇或七〇年代的經濟情況一樣糟，但因政治權力的同步變革，使前者與後者的結果截然不同。其主要差異在於：其一，政治改革的成功大部份應歸功於戈巴契夫放棄布里茲涅夫主義；其二，一九六〇年代的政經改革以黨內改革派爲主要推動力量，而一九八九年末的革命，其推動力量則來自黨外，首先是學生，然後結合知識份子、藝術家、編輯、工人等；其三，一九八九年革命的決定因素並非民衆對物資匱乏的不滿（雖然這種情形也存在），而是以年輕一代對自由的追求爲首要目標，最後經濟體制效能的低落才變成附加的推動力量；其四，共產黨倒台後，新政府所提出的政經改革概念與理想，遠非一九六〇年代所能比擬，政治方面採西方的議會民主制，經濟上則採行市場經濟制。具體言之，成功的政治改革是捷克經濟轉入市場經濟之最重要先決條件。

共黨政權崩潰後，由哈維爾領導的新政府，其首要任務，即如何因應以市場經濟爲導向之轉型期中的種種挑戰。布拉格政府的改革方針，一方面接受經改小組所提之完整且有效的改革建議，另一方面則不斷地重用一些傑出人士（他們亦是公民論壇中的活躍份子，例如：Valr Komarek, Václav Klaus），目前新政府所提之改革方案主要有下列四點：

(一)有關資產關係方面：捷克國會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八、十九日通過四項法律，使私有財產的發展得到具體可循的方向：1. 國營企業法：已於一九九〇年五月一日生效，其與一九八八年之不同處在於(1)簡要且適合市場經濟的需要；(2)加強主管的重要性。據一九九〇年初通過的草案建議，公營企業有三種：其一，是由一主管管理處經營的企業，如郵政、鐵路等公共企業；其二，是設立監督委員會和管理董事會的國有資本公司，這種公司其實只限於礦業和鋼鐵業兩種，其主要目的在於推動下游工業；其三，是自治的國營企業，其特點是已不再有所謂的「基層民主」(basisdemokratische form)的管理方式。^{⑤2} 2. 股份公司法：於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生效，是以德國股份公司法爲藍本制訂的，公司有監督委員會和董事會，而對於公司資金的供應與運用都有明白的規定。此法因與財產私有化具有密切關係，故相當重要。^{⑤3} 3. 外國合資企業法：這包括所有的外資企業，此法是修改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八日的法律而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九日公佈，其比前法更能吸引外資的地方在於公共建設計畫和商業利益高。^{⑤4} 4. 國民私有企業法：大規模的私有化是本法的主要精神，其中除了國有企業之私有化有待政府進一步規劃與立法外，目前有下列四項規定已於一九九〇年五月初生效：(1)對於私有企業之申請的核准，除專業性規定外，沒有任何繁複的行政程序之限制；(2)合夥人數沒有限制；(3)公司資產亦無限制；(4)在法律範圍內，每個私有企業有權與

註^{⑤2} Ibid., p.810.

註^{⑤3} Ibid.

註^{⑤4} Ibid.

外國做生意。⁵⁵

(二)有關價格政策方面：目前由中央主管決定的價格關係必須經由取消對基本民生物資及其他產品的補貼，或經由貨幣貶值和提高能源價格使其達到世界水平的方式，使價格體系快速地變革。為此，可能引發的通貨膨脹壓力，可透過加強競爭力和嚴格的金融與財政政策予以緩和。同時，既是供給者又是需求者的國營企業、合作社和私有企業等，應共同商定消費與資本貨品、民生物品、私有服務業的價格。此一「議定價格」關係到廣泛的貨物分配。⁵⁶

(三)有關資本市場方面：與一九六〇年代不同者，未來市場經濟的操作要擴展到金融、資本及外匯等範圍。經由國家銀行作業範圍內之商業部門的劃分及依此而建立的一些商業銀行，是建立合乎市場經濟之金融與信用貸款的基礎，而且可以作為外來資金之核准單位。事實上，一九八九年開始，企業已可保有外匯。企業外匯買賣、交易所的開放、財產政策、貨幣之可兌換性等措施，已為建立資本市場樹立了里程碑。⁵⁷

(四)有關勞力市場方面：建立未來勞力市場的改革建議主要強調以下四項要求：1. 要有合乎市場要求的效率刺激；2. 依市場條件而定工資；3. 裁撤冗員與無效率的單位；4. 工資政策不能與貨物及金融市場的平衡政策相衝突。⁵⁸

其他有關貿易自由化的推展，亦是建立有效市場機制的條件，在這方面，外國合資企業法、股份公司法 and 國民私有企業法扮演重要的角色。

至於捷克未來經濟政策的取向，布拉格的改革派人士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吸取寶貴經驗，深以為國家經濟政策攸關未來發展。他們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乃是「穩定政策」，捷克學者稱之為「均衡政策」(gleichgewicht politik)。

⁵⁹所謂「均衡政策」，特別是要在總體經濟方面避免不均衡，尤其是投資部門。換言之，國內著重消費市場的平衡，即注意人民的收入與消費品的充分供應；至於外貿方面亦應避免不平衡。一九八九年捷克外債高達八十億美元，但一九九〇年國際收支已有明顯的改善，比起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蘭等三國的通貨膨脹和高外債則大有進步。⁶⁰在擴大國家支出與企業的貸款方面，捷克財政部一反一九八九年的赤字預算，於一九九〇年所編列預算稍有盈餘。另外，縮減軍費及中央機構的支出，

⁵⁵ Ibid., p.811.

⁵⁶ Ibid., p.813.

⁵⁷ Ibid.

⁵⁸ Ibid.

⁵⁹ Ibid., p.814.

⁶⁰ Ibid.

並逐步取消對農業、礦業、住屋及近距離交通之補貼，亦是捷克財政改革新的方向之一。布拉格新政府鑒於過去的沉疴，要實現生產部門的結構轉變，實比保持國內經濟與對外貿易之平衡要來得困難。其間，必要的改變必須在整個已經崩潰的東歐經濟集團網路中進行，這些東歐國家與蘇聯的貿易幾乎都佔了外貿的一半以上。由於不當的外交與外貿政策，造成工業的單方面發展，原料及能源工業、重工業、國防工業等，造成了無謂的浪費。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學者建議，必須就此進行激烈的結構變革，使其成爲生產有益大眾的產業，如消費品、民生物資工業、房屋興建、環保及私人服務業等。此外，捷克本身擁有良好的工業基礎和便宜的人力，所以應建立高度加工的現代工業。基於上述考慮，學者專家們認爲，應把外貿重心逐漸從東歐，特別是蘇聯，移到西方市場，也就是說，在未來幾年內，捷克與東歐「經互會」國家的貿易要從百分之七八點五降到百分之五十左右。據一九八九年的資料顯示，捷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已降至百分之六十四，而與「經互會」國家的貿易則佔百分之五十八左右。^⑥但要把貿易方向從東方轉向西方，則企業必須提高效率，以符合市場競爭的需求，這對目前仍以基本原料和加工半成品爲出口大宗的捷克來說，實在是一大挑戰。

六、結 論

綜觀以上分析，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權轉移過程所展現的特點，可歸納如下：

第一，學生的角色突出：布拉格查爾斯大學和藝術學院學生在波蘭、匈牙利和東德掀起民主風潮之際，能够把握機會，藉着紀念五十年前被納粹殺害的大學生爲名，集會示威，提供了引發革命導火線的條件。事後，學生動員起來，說服工人挺身支援，凝聚力量，才使情勢急轉直下，始能逼迫共黨讓步。北平「八九民運」，因爲學生沒有聯合工人的力量，應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異議團體快速整合，反對力量大增，足以與共黨相抗衡：由「七七憲章」領銜的異議團體在展開大規模群眾示威之際，僅僅三天之內，立即整合大部分反對共黨的黨派，而成立了「公民論壇」，使反對勢力有統一的領導和步驟，既有組織，又有策略，在與共黨進行談判時，不致於讓共黨有分化或反撲的機會。

第三，「布拉格之春」的精神，人民記憶猶新，仍是推動改革的一股潛在動力：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一日華約集團鎮壓布拉格的改革運動之後，幾乎年年每逢該日，無論國內外，均有大小規模或暗或明的紀念活動。等到戈巴契夫上台大力倡導

^⑥ Ibid., p. 815.

「改造」和「公開性」政策，標榜「更新社會主義」時，又使捷克斯洛伐克人倍增信心，認為平反「布拉格之春」的時機日益成熟，隨時可因勢利導，創造有利條件。如杜布切克勇敢的公開露面，與異議份子相互聲援，因而喚醒了人民要求變革的勇氣和決心。

第四，捷共出乎意料的理性，肯與反對黨分享權力，沒有採取「天安門模式」：一九四八年捷共是通過聯合政府，再發動政變奪權成功。可是，四十一年之後，反對勢力也以聯合政府的模式，再通過自由選舉，光明正大地把共產黨趕下台。再者，捷共面對排山倒海的改革浪潮，勇於面對現實，除了追究失職領導階層予以開革外，並大幅改組，重整旗鼓，沒有執迷不誤，官官相護。最難得的是，「公民論壇」和「公眾反暴力組織」接掌政權後，基於人道精神，未以暴易暴，只有把布拉格共黨書記等少數人繩之以法，其餘高幹均從輕發落，不再追訴。⁶²

由於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權轉移過程具有以上的特點，因此，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布拉格的改革運動乃被譽為「絲絨般革命」，溫文柔和，整個進程平和穩定。

捷克斯洛伐克經過了這麼一次「絲絨般的」革命，是否就此步上坦途，一帆風順呢？這個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目前捷克聯邦政府尚有下列棘手難題，亟待克服。

其一，分離主義暗潮洶湧：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進程正在穩步推展之際，隨之衍生而起的分離意識却意外高漲。境內斯洛伐克族歷經奧匈帝國和捷共政權長期的壓制，當自由的火花照亮大地時，斯洛伐克民族主義宛如獲得解放，可以擺脫枷鎖，使斯洛伐克成爲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革命」成功之後，謀求與捷克人分道揚鑣的勢頭甚囂塵上，令人側目。布拉格聯邦政府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曾試圖緩和分離主義的緊張情勢，提出重新規劃聯邦體制的倡議，即把原來的捷克共和國一分爲三，變成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和西里西亞等三個共和國，而斯洛伐克共和國則改爲東、西斯洛伐克等二個共和國，藉此提升地方分權地位來緩和聯邦體制解體的危機。⁶³與此同時，聯邦政府與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共和國達成協議，賦予地方更大的權限，得在各自的內政上有訂定政策的自主權，惟國防、總體貨幣和對外關係等政策，仍由聯邦政府主掌。不過，尚有相當部分的斯洛伐克人不以此爲滿足，繼續倡議主權獨立。一般預料，斯洛伐克的獨立問題，可望由公民投票來決定其未來命運。

其二，經濟改革進程尚存諸多疑難：由實行四十年根深柢固的社會主義體制，要轉換成以市場爲主導的經濟制度，其所

註⑥③ Der Spiegel, Nr. 18/1990, pp. 180-186.

註⑥③ 自立晚報，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第八版。

遭遇的問題千頭萬緒，不可能在一、二年短期間內解決。未來布拉格聯邦政府亟待調整的課題是：(1)在激進與漸進的改革策略之間，應保持何種步調，才不致於造成社會的緊張。(2)在有限資源的條件下，什麼是改變結構的重點，其優先順序為何？是整治日益惡化的環境污染，抑或以基礎建設（如交通系統、都市計畫）為先，或汰換陳舊工業設備？(3)能源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擺在眼前亟待解決者，如何制訂節約能源政策，是否發展核能發電呢？或提高使用天然氣，或其他能源？(4)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經由市場機制以達成結構轉換的目標，可實現到何種程度，聯邦和地方政府系統能否充分配合，予以落實，而不致於使市場經濟的功能有名無實。凡此種種，都不是在最短時間內可以立竿見影，馬上奏效。

其三，「公民論壇」和「公眾反暴力組織」有分裂危機，可能影響政局的穩定性：「共患難容易，分享權力難」，捷克的「公民論壇」和斯洛伐克的「公眾反暴力組織」，它們在反共鬥爭中能夠發揮團隊精神，有效整合反對力量，終於把共產黨趕下台，獲得執政機會，可是，當他們嚐到權力滋味後，或因權力分配問題，或政策路線因激進與溫和之爭，難免有所分歧。目前，這二個推翻共黨政權功不可沒的姐妹聯盟，甫成立一年餘，就鬧「家變」，形成「務實」與「自由派」相互對抗，有分裂危機。^④這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穩定性不無影響。再者，共黨分子潛伏在政府各部門內，大有人在，最近屢有發現，很難說他們不會伺機製造事端。

此外，尚有必要一提者，捷克斯洛伐克在大步邁向民主化的同時，其在對外關係領域上，亦有重大突破。例如布拉格的「歐洲政策」表現積極，不但大力倡導建立「歐安會」新架構，而且是繼匈牙利之後，第二個東歐國家獲准加入歐洲理事會。最近，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哈維爾又以華約組織成員第一位國家元首訪問布魯塞爾北約總部，並公開表示，希望在公元二〇〇〇年以前，捷克斯洛伐克能夠成爲歐洲共同體的一員。民主化後的東歐國家，正逐步加入歐洲一體化的行列，這種發展是值得關注的。

*

*

*